

（二〇一五年四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往事非烟】 |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四） | 忻鼎亮 |
| 【狰狞岁月】 |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 杨里克 |
| 【风雨人生】 | 和空气动力学家潘良儒教授的一段交往 | 张鸿直 |
| 【荒唐年代】 |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经历 | 许木公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四）

· 忻鼎亮 ·

（上接 zk1503c）

五，余生的思考

1，我所理解的文革和造反派

文革是中国建国以来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一生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就在文革中度过，让我忘却这一年代是不可能的，简单的“十年浩劫”的评语和结论也难以令人完全接受。自文革结束以后，官方的基调就是“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主要罪状是打倒、迫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评价文革“宜粗不宜细”的权威话语的控制下，对文革的深层次分析讨论一概禁止，不但官方媒体忌讳文革，甚至民间的研究和讨论也可能受到警方的干预。其实，硬性设置禁区是罔顾历史的自欺欺人做法，十年间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能真的被人们忘记，也不会因为高压让所有人都缄默不语，只有在此期间作恶而又被粉饰者才妄想永远掩盖真相。由于民间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近年来不少文革亲历者的著作在境外出版，文革资料也不断闻世。特别是《记忆》、《昨天》等民间电子刊物、网站的发刊和流传，它给许多文革亲历者提供了一个话语平台，使文革研究的真实性和历史性都有了本质的突破。作为经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应有责任和义务还原历史的原貌，力求把真实的文革留给后人。

我认为：文革的整体面貌至今尚未有客观公正的评述，其中包括文革的起因、进程的分析、功过的评价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文革的起因涵盖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党内高层的宫廷斗争，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和文章流传，我作为一介平民，也难辨真伪，且不是草民们关注的范畴。另一层面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会积极参加文革，他们的动因何在？现在因为全盘否定

文革的主调得到各级当权者的认同，所以大多数人在谈及文革时往往强调自己的消极和厌恶，以表明从未与这类的邪恶同流合污过。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文革初期大多数人是以积极的姿态投入的。原因很简单：正常的公民都希望能有个好的政治表现。共产党的强项就是搞运动，每次运动后都会提拔一批积极分子，大家都明白，这是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捷径。

自从建国以来，决定社会地位的因素有：户籍、成分（家庭出身）、身份（所从事的工作）、学历，还有政治表现，其中最具不确定性和可变性的就是政治表现。文革刚开始，人们都敏感地意识到这是场空前规模的大政治运动，所以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文件和社论，积极参加运动当然是件非常正常的事。另外，毛泽东在运动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点是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的。不管毛本人是真心这样说，还是政治诡计，老百姓们从内心情感上是认同的。因为建国以来，整个体制是党领导一切，给普通百姓的实际感受就是党的领导决定一切，特别是反右斗争以后，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就是右派的等同语，平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受了委屈或不公正待遇，基本上无处申诉。当然，政府的大政策是大体保证了绝大多数公民的生存权，但个人的个性受伤害、自由被限制的情形比比皆是。具体执行政策的各级干部们，即便有的是真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也难免在处理问题上带有个人好恶，在基本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十七年来，干部们累计的积怨已经造成了干群之间的情绪对立，这也是运动初期许多人积极投入的重要原因。

运动刚开始，学生们是当然的先锋队，应该说，多数学生主流动机是为了争取有个好的政治表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积极表现形式是造反，潜台词就是：各级基层领导在运动前的许多工作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起来造反就必须判断清楚，以往的事情哪些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那些又是不对的，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就给争取好的政治表现增加了难度，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要紧跟党的基层领导就能遂愿。对造反内容的理解各阶层的和各个不同思想的人思维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十七年来一定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至少文革的发起者毛主席是这样认为的。造反派们认为：最主要的不合理是各级干部们享受着不受群众监督的特权，处事专横跋扈，不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而一些干部及高干子弟们则认为：十七年来对旧的剥削阶级政治上处理得不够狠（反映在血统论的对联中），对文化领域的四旧也容忍过度（反映在破四旧运动中），这样易造成资本主义复辟，产生修正主义。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矛头指向，引起了运动初期两派的激烈冲突。对于前一种思想，绝大多数干部是明确反对的，但对于后一种思想，造反派们未必都反对，只是认为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令大多数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居然支持前一种想法，千钧重的砝码使天平产生了不寻常的倾斜，以往的右派行为竟成了正确的左派。仅半年时间，造反的声浪对当权派的打击犹如摧枯拉朽，各级领导像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顿时丧失了长期掌握的权力，当年的威望一落千丈。这和他们十七年来积怨过多不无关系，保守派们除少数各级领导的亲信以外，也并非真诚地拥戴他们的上司，主要是鉴于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因选择造反过于危险才反其道行之，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

到了67年，运动的主战场成了新贵们为争夺再分配的权力，再由于军队的介入使形势变得混乱复杂。造反派们也明显分化，一部分造反派成了争功邀赏的新贵，他们持续了当初“走资派”的执政风格，同样压制不同政见，有的甚至更为跋扈；另一部分由于和介入运动的军队冲突，再次遭殃，成了新权力中心的反对派；还有一部分带理想主义色彩的造反派，看到了权力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专制体制的本质，文革运动仅是一场“换汤不换药”的罢官革命，于是有的开始逍遥，有的则成为政治异己分子，在后来的“清队”、“一打三反”、“清五一六”等运动中屡遭整肃。后来的运动再也没有出现1966年下半年的模式，结果都是权力方获胜，几经反复，新的政权渐趋加强，压制不同政见也随之加剧，群众监督领导完全成了一句空话。于是，激烈的政治权斗场所逐渐从群众运动转入宫廷斗争，不稳定的局面一直延至文革结束，十年的

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多数人在期间都受到过各种不同的心灵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它的谴责基本上是众口一词的，但其内容则并不相同。以各级党政干部为群体的人认为：文革中最坏的事情就是群众起来“炮轰当权派”。从当年“西纠”头目孔丹在文革后给陈云的信中可见，他强调“西纠”们没有参与“炮打”活动就表明文革中没干过坏事，至于肆意打人、抄家等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似乎不值一提。而陈云回复中则明确赞同孔丹的说法，表示他们是“自己的子弟”，文革中并无明显过错。这清楚地说明，干部们认为文革中最需要“拨乱反正”的就是“炮轰当权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彻底。随着群众“四大”权利的取缔，干部的权力被无限扩大，不受人民监督的程度比文革前更甚，为后来干部们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先决条件。普通老百姓们的感受则不同，他们对文革最痛恨的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文革中，几乎人人都存在着成为阶级敌人的危险，没有可行的法制保证个人人身不受侵犯，再加上经济遭破坏，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导致对文革怨声载道。更为可怕的长效性破坏是在科技文化领域和道德领域的负面影响，知识社会价值的低落除了在八十年代稍有好转外，其社会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道德沦丧的社会化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修复，可惜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不但没有认真做，反有加甚，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以至于当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时，还因国民素质低下而被人看不起。科学和民主是现代自由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这方面遭受的损伤负面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我国人民至今未能有真正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造反派是一个特殊群体，它因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起来造各级党政领导的反而得名。因官方对文革评价的影响，这一群体现在被严重妖魔化了，被描绘成一群胡作非为的破坏分子，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造反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革中后期进入政权机构者，上至王洪文及当上各省市领导的代表人物，在人数上是造反派的少数。他们确实成了文革的新贵，不同程度上做过各类坏事。大多数造反派虽有半年的风光，但在以后各阶段政治波折中相继落马，早就被新政权抛弃，而且多被整肃。再加上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补课”，能全身而退的数量甚少，可以说，他们是文革中境遇最惨的一个群体。事实再次告诉全国人民，在现存的体制下，反对领导就是“大逆不道”，有独立政见就是“图谋不轨”，一定会遭到最严厉的报复。

对于造反派有几点需要强调的：第一，他们是思想上能独立思考，不屑于奉承拍马，敢于与领导抗争者，他们选择造反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风险，投机因素不占主要成分；其次，文革中破四旧，毁坏文物，肆意抄家，对四类分子进行人身虐待，基本上是保守派所为，当时造反派位于少数，身处险境，生怕受人以把柄，不敢也不能做这类的事；第三，造反派绝不是文革得益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文革受害最大的人群，遭到整肃最为严重，身心两方面都遭受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当然，造反派们垢弊也不容掩盖，我也不能认同有些文革研究者的见解，认为造反派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者，“炮打司令部”是开创民主运动的先河。造反派的行为实际上也没有民主理念，他们对付政敌的方法也是无限上纲、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同样也是政治整人术。这样斗争的发展必然会演变成武斗，形成暴民政治，这与和平、非暴力的现代民主运动相距甚远。重读当年造反派们的大字报，确实带有较严重的极左派腔调。

学生造反派更是遭受文革蹂躏的重度受害者，他们与已有职业的人员不同，很少有个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动机，理想主义的成分占多数。如果一定要细究其功利性动机，基本上是为了争取一个好的政治表现，也就是孙怒涛所说的：想当个党和政府认同的“优质”大学生。运动初期，在我所接触的大学生中几乎都是积极参加运动的，而且都是积极跟党走的，其动机应该说是很纯洁的。因为家庭或个人原因想捣乱的基本不存在，即便思想上有不满，也不敢在一开始就有所表现。当时，大家比拼的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紧跟程度，在基层党组织失控的状态下，评判和结论只能从报刊的社论中寻找。如果，某张大字报的观点和后来的社论精神

吻合，那么大字报的作者就会成为大众认同的左派。这样，学生们就以极其认真的态度研读每天的报纸，强调认识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创新观点的正向效应，最初的学生造反派大体都是这样产生的。从性格角度分析，这些人大多有独立思想，不喜欢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且有一定的冒险倾向，因为判断一旦错误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应当说，最早期的造反派领头者大多数是出身和表现都比较好的，因为如果这两方面有亏，不但号召力受影响，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那时的领头人物没有任何上层的指定，完全靠的是自身的影响力，应当说在能力上必有过人之处。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处于少数地位时，其核心人物和骨干在思想、道德、智慧和能力各方面，正向因素应该是远大于负面因素的。后来，造反派形成了帮派成了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角色，并在角斗中逐渐占了上风。那时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成分急剧淡化，为自己的帮派争取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成了主要目标，届时进入造反队伍者，其动机就难以判断和估测了。初战暂时获胜的造反派大体都这样考虑：最高目标是力求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争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话语权，最坏的底线是不能被打成反动组织而遭受整肃。这样，“君子不党”的古训已被抛在脑后，早期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则被实际的功利淹没了。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冲突和权力再分配，那些早期领头者，少数人被社会地位和权力所腐蚀成了运动的新贵，多数人在各个阶段和新权力集团发生了冲突，成了运动的牺牲品。后来，经过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学生造反派的骨干们几乎很少有人幸免，成了文革中受害面最广的一个群体。直至文革结束后，对“三种人”的反复清查，应该说，文革初期的造反骨干能免于整肃的基本没有了。数十年过后，这批才能超于常人的群体在政界上层已经绝迹，少数人在科研领域或是商场中凭着自己的才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大多数境遇悲惨，个别的连基本生活和基本人权都不能保证。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坎坷，当年对党的真诚热爱自然不复存在，多数把政治视作为畏途，被迫安于苟活。少数继续关心国事者中，现政权拥趸寥寥，有向往民主政治者，希望中国顺应世界潮流；也有沉迷于文革不能自拔，成了新一代的“毛粉”。

文革应当否定这是无疑的，但我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仅是66年下半年到67年初的群众起来“炮打司令部”这一阶段。虽不能说这是民主运动的雏形，但老百姓以独立公开发表政治见解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向不受监督的官员们挑战，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尽管其中多有偏颇和弊端，至少能容忍这样大规模地公开发表政治异见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也是对官僚特权一次巨大的冲击，将官场的弊病和劣迹公示于众，使群众开始认识到专制制度的危害性，无疑是促进社会改革的冲击波。另外，这一运动过程至少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官僚体制的积弊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民怨，以至于不少群众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加入造反派的队伍。

2，社会进步与不同政见

我本是一个适合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文革中误打误撞陷入了政治圈，历经磨难，终于又回到了我原来专攻的力学专业，从事人体力学的研究。人生的这一波折，我没有后悔，反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科学与民主的相通。“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恒定的精神追求，它既是读书人固有的理念，也是社会进步永恒的思想动力。科学和民主的灵魂就是创新，创新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所以，独立思维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在自然科学领域，现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鼓励创新，像哥白尼时期那样的惨剧基本没有了。但在政治、社会变革领域，由于有专制政体的存在，独立创新思想就不很畅通，当政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往往会运用公权来迫害独立思想者，反右运动如此，一打三反运动也如此，直到“六四运动”，类似的情景依然延续着。

其实，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应当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有其最佳化模式，最优化途径，目标函数应是全体国民的最大利益。事实上，各国政府都在研究这样的课题，但因

为其中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当政者就不愿意正视客观现实，让各种不同政见进行深入讨论和实践试行。世界上把有独立见解与政府意见不同的称为不同政见者，在我国则以公共知识分子名称代之。不少政府对这类人相当厌烦，千方百计企图迫使他们闭嘴，当年的苏联及东欧诸国皆是如此。一个国家只允许一种声音，这与世界进步的民主潮流非常不相容，压制不同政见，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社会冲突。反之，宽容他们，参考他们的政见反能合理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推动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和谐。我认为，对不同政见者的容忍度是当政者的自信力和民主意愿的标志。一个工程系统，如果没有负反馈，系统一定会崩溃的。社会问题也同样，一个国家没有不同政见（主要是反面意见）同样不能长治久安，早晚会有动乱，这不是“境外敌对势力”制造出来的，而是系统本身存在问题。所以，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进步利多弊少。有人担心他们的存在和发声会影响政权的权威性，可能造成政权不稳，甚至被颠覆，这完全是专制体制下的思维模式。首先，如果一个政权被批评就会垮，那么这个政权非常脆弱，一定不代表人民。再者，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特征就是非暴力非团伙性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只有和平、理性的抗争，根本不存在对政权的实质性威胁。他们大多来自知识界，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背景；能公开表示不同政见，就表明评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并非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能对社会问题提出独立见解，则表明热衷公共事务有奉献精神。如果，这样的知识精英都不能容忍，很难让人相信当政者是真心为了国家强盛和社会进步。

其实，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古来有之，他们始终是历代专制君王的眼中钉，接二连三遭到迫害和整肃，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启了整治异己知识分子的序幕。虽然唐代诗人章碣明确提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指出了读书人不会搞颠覆，但仍然减轻不了独裁者对来自文人反向言论的憎恶和打击。在宋代，文人的处境相对最好，因为宋太祖有遗诏，对进谏向君王提意见的文人一律不杀。这样就形成了“清流派”的文人阶层，以议朝政批评当政者为荣，所以，宋朝虽然军力衰弱，但科技文化则是历朝中最繁荣的朝代之一，这与开放言路容忍不同政见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民国时期，世界上已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博爱、平等、自由已成了基本人权的内容，形成了知识阶层的共识。共产党就是以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践踏民主作为号召民众的武器，延安的《新华日报》始终以倡导民主为主调。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讲话明确提到：“当前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执政后，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宣传，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专政的手段进行镇压，反胡风是如此，反右也是如此，文革中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更是如此，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整肃的人也一次比一次多。结果反对意见不但没有消除，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大量的正直且有社会责任感和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社会上阿谀之风陡长，奉承拍马的小人和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接二连三地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国家的兴旺和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不同政见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它是社会的调节系统，有利于执政者不断地改善社会管理，推动时代进步。反之，如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同政见采用专政手段压制，必定会使社会畸形，产生内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崩溃，苏联和东欧诸国就是明显例证。事实上，对待不同政见的态度是考量执政者是否真心推行民主政治的标尺，这也是普世价值的内容，专制政体是应该到了被彻底淘汰的时候了。

3，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我认为：文革最大的祸害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知识就是力量”这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真理，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知识不断的更新中实施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核心动力。

当年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指出与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引导社会进步的群体。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得出产业工人阶级是推动社会进步主

力军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取代了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了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相联系的阶层。（近期在网上流传的普利汉诺夫的封存遗嘱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纵观世界各国，凡是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的国家，相对都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都将会出现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各种形式的政局动荡。

我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那时对知识分子还是足够重视的。从经济地位看，按1955年工资制定标准，教授收入比司局长略高，副教授比处长略高，讲师、工程师比科长略高。从社会地位看，知识分子普遍受到尊重，对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事）也有一些话语权。随着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开展，知识分子们常常成为受整肃的主体，反复被提醒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认真接受改造”。因此，其整体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文革期间降到最低点，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列为“臭老九”，读书无用几乎要变成了读书有罪，科技文化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动荡，百姓受难。十年浩劫过后，确实引来了一段可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春天”的日子，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语千钧口号的引领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骤盛，考大学、考研究生改变命运为广大年轻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不用屈辱地乞求权贵并切实可行之路。不久，又恢复了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并确定了技术职称的工资级别。教授工资介于行政正局和副局之间，能享受高干的医疗保障，工程师的工资略高于正科，虽然这比建国初期的地位略有下降，但对“臭老九们”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大多数人都感到报国有门。

随着权力的经济杠杆作用的日益增大，知识的社会价值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在后改革开放时代，权力和金钱成了社会权重最大的两个要素，随之而来的则是：知识贬值，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腐败盛起，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公信力下降，老百姓怨气上升。经济的连续增长掩盖不了这些社会弊病的繁殖，也没有使人民实际体会到真正的和谐和幸福，知识界又陷入了新的彷徨。不平则鸣，历代如此，现代化的网络成了我国知识分子公开、和平、理性地表述不同政见的唯一场所，虽然经常被一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们诬蔑为受西方敌对势力操纵，但呼吁民主，呼吁整体改革的声音始终不断。因为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已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也是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权利，对它的容忍度是检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推行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准。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境遇也应当是社会是否真正和谐发展的衡量标尺。近年来，知识分子待遇与行政官员相比，相形见绌。以上海为例，1993年开始将教授级的医疗高干待遇取消了（曾许诺以后恢复，至今未见任何兑现迹象），如今普通教授的实际收入只能相当于公务员中的科级，对公众事务的话语权更是微乎其微。知识和知识分子没有体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这样将产生的负面后果迟早会显现出来的。

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最自我欣赏的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喜欢直言的秉性。年少时就是这样，愉快、顺利地渡过了学生时光；文革时过度爆发，以致惨遭整肃；劫后依然如故，坎坎坷坷地走完了从业生涯；风烛残年还要这样，把一些本不应该示人的回忆见著于世，给自己的晚年添烦。此时，不禁想起《屈原·涉江》中的名言：“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本性难移也罢，生不逢时也罢，我总是想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完，为人生不留遗憾。

（全文完）
~~~~~

【狰狞岁月】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 杨里克 •

我杀过鸡。杀鸡时，要左手抓牢鸡，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地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完事儿。问题是鸡会垂死挣扎，拼命扑腾；有时下手不准、不狠，事情就有点儿麻烦，一只鸡半天杀不死。

我也杀过人。4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遍及全国的武斗狂潮中，我们几个红卫兵造反派枪杀了一个对立派的“俘虏”。食指轻轻一扣，哒哒哒，对方就完蛋了。简单。

事后，我当众发表感慨：这年头儿，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40年了，很多事已经淡忘、淡化，但杀人的事我忘不了。为此，我已经受到过严厉惩罚。40年了，没人愿意让你提起，现在可以说了。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面对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我向亡灵表示深深的、深深的忏悔。

1966年，我在四川西昌高中读高三，刚刚通过毕业考试，就遇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文革”一开始，我参加了保皇派红卫兵群众组织。很快，保皇派就被造反派彻底击溃，土崩瓦解。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蛊惑下，我随即参加了造反派。西昌地区成了造反派一统天下。但在如何对待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结廷的问题上，西昌地区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互相攻击，内斗不止，上纲上线，日趋激烈。

对立派背后有西昌军分区暗中支持，我们这派背后有铁道兵部队暗中支持，双方相持不下，互不相让。从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石头、棍棒、钢钎、藤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真刀真枪从哪里来？到解放军那里去抢！抢枪那么容易？其实，有的是“明抢暗送”。

西昌地区1967、1969年爆发大规模武斗，事后统计，死伤2000多人。

就记忆所及，我知道的因武斗而死的人员，列举几例。

（1）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是烈士遗孤，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好像没有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就算运动初期参加派性组织，也不是活跃分子，后来也是一个“逍遥派”。1967年的一天他到学校去，据说是去问烈士家属抚恤金。结果被盘踞校内的武斗人员（全是初高中学生）抓住，不由分说，关押几天，拳脚相加，活活打死。死后无人追究，不了了之。

（2）秦同学之死。1969年我们到西昌地区所属一个县份去抢枪。在武斗激烈的混乱形势下，部队将枪支弹药埋入地下。我们有100多人，漫山遍野，盲目搜寻。后来在部队“内部人”暗中指点下，终于找到一些埋藏地点，抢到部分枪支弹药。枪是战士的生命，部队组织众多士兵包围我们，企图将被抢的枪夺回去。我们在汽车上，一边向士兵头顶上方开枪射击，一边加大油门，强行突围。慌忙之中，汽车开错方向，来到河边，熄了火。而解放军大队人马跟踪而至。情急之下，弃车而逃，徒步涉水，冒险渡河。悲壮之情，颇类“八女投江”。我们几个同学手牵手向河里走去，有的背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走到河中心，突然遇到一股湍流，将我们四五个人一下冲散了。我当时肩扛一箱子弹，斜挎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下就沉入水底。只好扔掉子弹箱，拼命游向对岸。上岸之后，发现半自动步枪也不见了。秦同学沉入水中后，再也没露面。

（3）崔同学之死。1967年，在一次抢枪行动中，小崔同学被军火库守卫用棍棒（或枪托）击中头部，当即身亡。他是初中生，年仅十四五岁。

（4）武同学之死。武××是初中生，西昌军分区司令员之子。1967年某天晚上，坐在汽车上强行冲关时，被我方乱枪击中，当即死亡。

（5）王同学之死。王××，女，我校本派同学，瘦小孱弱。被女友玩枪走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父为本派“铁杆”，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火线上！”

（6）王同学之死。王××，男，本派初中生，派头头儿。被对方制造的大楼爆炸压死在底楼。

（7）卢同学之死。卢××，本校同学，对立派头头儿。被他的初中生“警卫员”面对面擦枪走火击中，当场死亡。

（8）“小长生”之死。“小长生”，英俊少年，活泼可爱，面红齿白，人见人爱。他是我方某派头头儿的警卫员。在一次坐车经过我方关卡时，被我方守卫误会，中弹身亡。

（9）武氏兄弟之死。武××，工人，我方武斗队员。浓眉大眼，气概不凡，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一看就是武松式的英雄人物。1967年某天晚上，护送我方某派头头儿返校时，被我方警卫误会，慌乱之中，开枪击中头部，掀去半边头盖骨。英雄气短，令人扼腕叹息。武××死时年方20来岁。他有一个弟弟，年仅10岁。某日，武妈妈牵着他和我方众多群众到西昌军分区门口和平请愿，被隐藏在军分区内的对立派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可怜的小弟弟当场被炸死，武妈妈也被炸断右手。武斗结束后，我在街上看见武妈妈靠卖凉开水为生，一分钱一杯。

（10）张同学之死。张同学，我校对立派武斗头目。威武雄壮，声名远扬。1967年武斗初期，在一次游行示威时，被我方小口径步枪击中头部身亡。

（11）江浙同学之死。1966年，从江浙一带转学过来一个同学。同校时间太短，已记不清姓名和相貌。1967年武斗中被对方抓住，当场枪毙。大约从那时期起，双方仇恨升级，开始互相“枪毙俘虏”。谁先动手，已经分不清了。在“好人打坏人活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说法儿影响下，双方都将对方当国民党，往死里打。

（12）“红背心”之死。1969年，在一次战斗中，我方将对方击溃。对方武斗人员藏匿于当地群众当中，一时无法分辨。但对方有一人身着红背心，十分显眼，被我方从人群中抓出来，当场枪毙。

（13）女卫生员之死。1969年，一场战斗中，我方击毙对方十余人，活捉一名女卫生员。我方武斗队员欢呼雀跃，围上去动手动脚。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调戏妇女，成何体统？我方头目（在校大学生）见状大怒：“给我拖出去毙了！”结果，不是把流氓毙了，而是将女卫生员毙了。

（14）尹排长之死。尹排长是“支左”解放军，在派性冲突中被杀，原因不明。我亲眼见过法医检验他的尸骨。



（15）芦大学生之死。芦是四川林学院我们这派的大学生。1967年武斗时，他率领十多个大学生组成的迫击炮班驻守在林学院内一栋小楼上。一天晚上，对方潜入楼下，设置炸药。一声巨响，炮班十余个年轻人全部死于睡梦中。此事终未破案。

（16）林大学生之死。林大学生是四川林学院大一学生，西昌人，高我一届。1969年一次武斗，他们那一派被我们击败。他和几个人在掩护撤退时被俘。当天晚上，他们即被枪杀于安宁河边。参与杀人的就有他的大学同学代某。

以上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闻的。也许个别细节有出入，大致情节不会错。因为在当时，在地区一级范围内，很多事情都是当即传开，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很多血泪故事，回想起来就令人恐惧、伤悲、惆怅、愤懑。那年头，我见过太多的血、太多的泪。泪干了，血消了，人民总是淡忘。“时间永是流逝，街市永是太平”。

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书面联系过某著名作家和某著名学者，请他们根据我的口述，写“文革”中的武斗。后来都没有下文。如果有心的作家潜心研究“文革”，收集资料，默默耕耘，定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文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千载难逢的，匪夷所思的，波诡云谲的。它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本质。趁现在当事人还在，抓紧时间吧！

希望“文革”亲历者，都能写下对“文革”的回忆。总结教训，共赴明天。“我经过昨天，我知道明天。”（埃及法老图坦卡蒙语）

1969年，双方势同水火，都想打垮对方。当然是武力打垮。讲理、辩论都失去意义。当时，每个单位几乎都分成两派。哪派势力大就把对方排挤出去。西昌城中，双方犬牙交错，互相攻战，狼烟四起。

城中心的大礼堂为对方武装盘踞。地处要冲，对我方威胁很大。“总部”决定武力拔除。

战斗在上午打响。我们几个中学生在火力掩护下，翻越围墙，进入对方阵地。对方从楼上扔下一颗手榴弹，在我身边爆炸。我只觉得有东西进入我的小腿，并不感到疼痛。顿时鲜血淋漓，我被送往医院。幸好，最大的一颗弹片——葡萄干大小，打穿烟盒，打断指甲刀，打穿军用皮带，进入肚皮表层。指甲刀救了我一命。

医生手忙脚乱，不知何故没有打麻药就给我扩创，剝去烂肉，取出5、6个弹片。后来2003年，我出车祸后照片时发现，身上还有两个弹片。它们至今还在我体内。

在此之前，我还受过轻伤。一颗菜籽儿大小的手榴弹弹片，打入我的右眼角膜。医生在角膜上划了一刀，用吸铁石吸出来。当时角膜上有一道白雾，像白内障。后来自然消散。年轻人，受伤恢复快。只不过，视力变为1.0。

1969年，在省革委和西昌军分区支持下，对方将我方全部赶出城外。我们四处流窜，抢枪，杀人放火。西昌地区10个县，我们打遍8个。武斗结束后，四川省革委给我方的调查结论是：“走一路、杀一路、烧一路、抢一路。”其实哪派都这样。

我方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后，兵分两路，杀向西昌（城），口号是“血洗西昌（城）”。进军路上，我们偶遇对方四个武斗人员。当场打死三个，活捉一个。这俘虏叫田德强，中学生，武斗

小头目。当场审讯，我做记录。田已负伤，坐在我们面前，非常镇静，令人敬佩。

田德强见四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便缓缓地主动说他家里还有一支56式冲锋枪，他可以叫人带来缴给我们。言外之意，让我们饶他一命。谁知我们头头儿嘴角一歪，他身边的警卫员立即扣动扳机，“叭”，一颗子弹正中田的脑门心。弹孔正圆，像海豚的呼吸孔。正面没有血迹，脑后没有创口。田一声不吭，身体一歪，慢慢向左侧倒下去，一动不动了。没有挣扎，没有扑腾，没有慷慨激昂，没有任何预兆，一个年轻的鲜活生命，就在我们面前消失。

可是，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

武斗中，如同战争一样，谁也不知能活到哪一天。我想，德国纳粹残杀犹太人，苏联红军枪杀波兰军官，日本人南京大屠杀，“无产阶级专政”杀害张志新、林昭，其具体执行人，可能也跟我们那时一样，没什么感觉。

后来知道，田德强的同伙中，有一个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马××。他是负伤后举手投降，再被我方当场打死的。我那天正拉肚子，浑身无力，没有冲在前头。否则，我可能能救他一命。在“文革”中，我有三次被对方抓住，其中有两次是被对立派同学看在同学情分上释放的。当然，那时双方对立情绪还没有发展到互相枪毙俘虏的地步。否则，我这种武斗积极分子，被对方俘虏，肯定毙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武斗队占据了××工厂。××工厂是战略要地。对方曾动用大部队，企图武装夺回，被我们击退，激烈的战斗逐渐平静下来。有天晚上，我感到口渴，到工厂食堂找水喝，看见4个武斗队员在悄悄商议什么。

工厂食堂里关押着一个成都知青，对立派的。他是被当地农民捉住后交给我们的。不知道他参加过武斗没有，据说对当地农民很凶悍。我历来对打、杀俘虏不感兴趣，没有参加对他的审讯。只记得他20出头，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但送来时已被暴打过，奄奄一息了。

我方武斗队员欺骗他说，我们准备释放他。他便强打精神，随着我们蹒跚而行。在漆黑的夜里，周围都是齐腰深的野草，我们一行人向工厂旁的河边走去。他逐渐发觉情况不妙，便开始哀求我们饶他一命，说他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非常可怜。说着说着就停下不走了。我们威胁他说，不走就当场打死他。

事已至此，插翅难逃。他绝望地抬头仰望星空，一声长叹：“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不说话，默默随着我们来到河边。

他一个人站在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我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当时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几声手枪声划破夜空，成都知青身中数弹，应声落水。沉入水中后，身体又冒出水面，没有任何动静，慢慢向下游飘去。

这时，我突然冲动，抬手扣动扳机。“哒、哒、哒”！我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4个人吓了一跳。

杀完人后，我们5个人默默回去，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我说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地区武斗结束后，当地公检法对武斗情况进行了多次清理。我们偏远地区的人都很老实，只要被传讯，一般都是老实交代。事情很快真相大白。我是“下乡插队落户”后1970年被传讯的。关押了10天，问题交代清楚，就被释放了。当时对“革命小将犯错误”还比较客气。公安人员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

枪杀成都知青一案涉案5人，除我之外：本地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被判无期徒刑，可能他们还有其他更严重的“武斗杀人罪行”。一个“军工”，被军法审判，不知结果，好像被清退回家了。一个成都知青，因他的父亲与公安局长有关系，平安无事。

当年，我积极投入“文革”洪流，是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满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革命激情，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和朝气，渴望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967年，武斗刚开始时，我是怀疑、厌恶、反对的。一度准备逃离是非之地。可是对立派包围了西昌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我们走到一个县被抓住了。幸好对立派中有一位我的同班同学，悄悄将我们放了。我们只好原路返回。逃离已不可能，被对方抓住必死无疑，最后不由自主地陷入武斗漩涡，被暴力裹挟，不能自拔。

1969年底，我下乡当了知青。开始还是打算安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们偏远地区的中学生，从小学、中学就经常到农村劳动锻炼，对艰苦生活习以为常，在农村生活也无所谓。我们下乡地点就在当地农村，和北京、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云南不一样，他们反差太大，距离太远，比我们困难得多。

但是，知识青年在农村看不到任何希望。农民从来都把知青看作城里人而不是农村人。恰逢西昌地区大招工，我们西昌地区的知青绝大多数当了工人。当工人就应该做个好工人。我刚刚想实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梦想，就被迎头痛击，打入“地狱”。后来，一不小心，居然当了技术干部。从“阶下囚”到“人民公仆”，不啻从“地狱”到“天堂”。

风雨苍黄60年，我一直喜欢看书、学习、思考、争论，始终保持年轻幼稚心态。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我挨过饿，我知道人权；我杀过人，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工人农民，受过剥削压迫，我知道人权；我当过“罪犯”，我知道人权；我当过干部，我搞过腐败，我知道人权；我通过国内书报了解国外信息，我上网，我知道人权。集60多年人生经验，我早就认为，只有民主法制才能救中国。

这就是我的心路转换历程。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比较研究的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只要不被洗脑，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自然会接受现代民主。希望大家都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畅所欲言、言论自由，世界一定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 原载《我们忏悔》

~~~~~

【风雨人生】

和空气动力学家潘良儒教授的一段交往

• 张鸿直 •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的“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逝世。接连几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媒体，都用醒目的标题加以报导，热烈称颂这位中国航天事业一代宗师的丰功伟绩。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和钱学森几乎同期从美国归来的另一位空气动力学教授潘良儒先生，以及我们两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美国不期而遇，相识，相交，进而成为忘年交朋友的一段往事……

我们大学所在的诺福克市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港口城市。一九八八年秋季的一天，我到K-mart去买东西，在那里偶遇一位老先生，年纪在六，七十岁。在攀谈中知道他叫潘良儒，四十年代由国民党政府派出赴美留学，先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拿到硕士，接着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此后留在康大任教，直至五十年代中期回国。近几年来，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等离子体协会理事长。一九八七年，他应英国剑桥大学邀请，当了该校一年的客座教授。因为他的太太和女儿在美国，故于一九八八年从英国到美国与家人团聚。他特别向我解释说，他刚刚结束了在母校康奈尔大学三个月的合作研究，因手上有一本书尚未完成，故暂时滞留美国，没有回国。

我好奇地询问四十年代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他自豪地说，中国留学生个个成绩名列前茅，令美国教授和学生刮目相看。四十年代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并施行种族隔离，街上的公共汽车上明文规定白人坐在车前面，黑人坐后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附近，镇上的人很少见过中国人，不知道该让中国留学生坐在车前还是车后。最后决定按衣着而定：若穿戴整齐，则在车前和白人坐在一起，若衣衫不整，则和黑人坐在车后。“对我们的种族定位，恰如我们的肤色一样，是在黑白之间。”

潘良儒的太太叫丁德中，原为北京一家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在与潘良儒认识前曾结过婚并有一个儿子，那时在国家建委工作。她和潘良儒结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及女婿都是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电脑工程师。小女儿嫁去瑞士，正在当地的一所大学读书。丁德中四，五年前赴美，在大女儿家帮助照顾外孙女并且拿到了“绿卡”。可是潘良儒一心想着国内的工作，不愿意在美国无所事事，死说活说不肯申请“绿卡”，夫妻正为此事达不成协议而苦苦争执。丁德中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权衡利弊，从中周旋，劝说潘良儒留下来。丁德中说话时，潘良儒双眉紧锁，好像有什么心事，几次欲言又止。天色渐晚，我们交换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临分手时，丁德中嘱咐我们如若打电话给他们，最好是在白天四点以前。否则，女儿，女婿一下班，就无暇谈话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太太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潘良儒年逾七十，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却宁愿为他所说的“发一分余热”而离开妻子儿女，独自回国呢？是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是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还是对他毕生从事的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然而，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月后，太太和我备了晚饭，接他们过来做客。吃饭时，潘良儒慢慢向我们讲述了四十年来往事——

潘良儒一九一七年生于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国民党政府的选拔和培训后，由政府资助，被派到美国留学。和潘良儒同时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中国留学生共有五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国共两党内战重开。至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节节败退，摇摇欲坠。国民党自顾不暇，中国留学生的财源断绝，人心惶惶。为度过暂时的经济困难，潘良儒召集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中国留学生开会，商量解决办法。那时候五名同学的硕士学位都几近完成，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潘良儒提出由较早毕业找到工作的人负担其他人的学习和生活费用，直到五人都完成学业。潘良儒的提议得到了三个人的支持，只有一位姓郭的人因马上毕业而反对。他

说：“我谁也不帮助，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话既已说到此处，潘良儒等四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骑驴看唱本一走着瞧了！”说来也巧，潘良儒所学的空气动力学是五十年代的热门学科。所以，潘良儒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薪水也拿得蛮高的。可那位学农的郭姓同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找到工作。潘良儒性格倔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此，他担负起其他三个人的学费和食宿，直到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学业。那位郭姓同学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怨恨潘良儒没有资助他，与他结下了冤仇。

离开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并短暂工作之后，潘良儒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时间过的真快，转眼来到了一九五五年。潘良儒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生活平静舒适。他的妻子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全家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看似平静的生活却突然起了波澜：在康奈尔大学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些人经济上遇到了困难，潘良儒常常解囊相助，或尽力帮助他们寻找资助，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这居然导致了潘教授此后一生的厄运。

五十年代的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的作祟，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无端被冠以“亲共分子”，“共产党嫌疑分子”，全国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钱学森等一批著名的中国留美科学家遭到了无理的迫害，并先后回到了中国。一九五五年的一天，移民局的官员突然约谈潘良儒，说他曾经资助过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并且从此开始对潘良儒进行全面调查，试图弄清楚他们之间是否有政治和组织上的联系。经潘良儒的律师与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交涉，才知道原来是潘良儒在弗吉尼亚上学时的郭姓同学打了“小报告”。其实，潘良儒对他所资助的学生的政治背景一点也不了解，只凭“中国人帮助中国人”的一片热心，才引火上身的。鉴于当时美国国内的情况，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根本不相信潘良儒的解释。潘良儒的律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移民局那里讨回一句活话：潘良儒必须承认自己错误地资助了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从今以后，与其划清界限，痛改前非，下不为例。

潘良儒从律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大不以为然，凭他的那股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倔强脾气，断然拒绝认错，并公开说：“我资助的是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嫌疑分子，我都没有错，更谈不上什么痛改前非！”在僵持了几个月之后，移民局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对潘良儒起诉，并在不久后将他驱除出境。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当地报纸曾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新闻。

潘良儒的妻子认为他不识时务，宣布与他脱离婚姻关系，带着他们的大儿子留在了美国。一九五五年，潘良儒带着小儿子回到了阔别十载的祖国。

潘良儒回到北京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从事航天器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并在钱学森人主编的“力学学报”任编辑。潘良儒因遭美国移民局迫害，愤愤不平，决心以一片赤诚之心报效祖国。他和钱学森等科学家一起，全力以赴地参加和制定中国的火箭和导弹发展计划，还在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政治学习中控诉在美国遭受的种族歧视和无端迫害，为此，力学研究所任命他担任该所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召集人。

说来无巧不成书，潘良儒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那位郭姓同学在美国混得不好，比潘良儒早一些回到中国，被分配到位于西安市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科学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且加入了共产党，还当上了研究院的党委委员。潘良儒回国的消息传到他的耳中，令他寝食难安。为了掩盖在美国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先发制人，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共产党组织写了一封检举信，谎称潘良儒在美国和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很可能是被中央情报局派到中国的潜伏特务。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建国起就公开宣布向苏联为首的共产党国家“一边倒”，再加上韩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造成中美两国的敌对关系。美国的潜伏特务当然非同小可。

潘良儒那时正从事着极为机密的国家发展航天工业的规划，这“美国潜伏特务”的举报令力学研究所的共产党组织深感棘手，因为那时候大陆和美国一无外交关系。二无直接商业往来，如何能查证落实？所领导在大伤脑筋之后，决定将潘良儒的“美国特务嫌疑”写入他的档案，待日后调查落实，同时为保密起见，将他调出力学研究所。为了使潘良儒不致察觉，所领导谎称国家急需研究海洋潮汐发电，特调他前去主持工作。这是“党的信任”，云云。潘良儒在学术上极具智慧，可在政治上却非常幼稚，他真的捧着“党的信任”去研究海洋潮汐发电。几年之后又被调去搞大型锅炉的余热利用，其理由仍然是“国家急需”，“党的信任”。因为大陆的个人档案只许人事干部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看，故潘良儒一直被蒙在鼓里，兢兢业业地搞科研，而且科研硕果累累。

一九五八年，潘良儒和中国科学院医院的皮肤科医生丁德中结婚。丁德中比潘良儒小十几岁，不但长得漂亮，性格也活泼开朗。

一九五零年，中国共产党派了百万“志愿军”参加韩战时，丁德中刚好高中毕业。凭着年轻人的一股爱国热情，她报名参加了医疗队，准备赴朝鲜半岛抢救伤病员。医疗队乘火车到达东北后，原计划改变，上级要求他们医疗队留在中国东北治疗和护理从战场转下来的伤病员。五十年代的中国，按共产党的号召，申请加入共产党是年轻人求上进的表示，丁德中也和医疗队的其他年轻人一起，递交了申请书。医疗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单身汉，他见丁德中长得漂亮又有入党要求，于是起了歪心。他先以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多次找丁德中谈话，美其名曰“关心求上进的青年人”，而后居然无耻地说：“你要想入党就得和我结婚，以实际行动靠拢党组织。”丁德中一听，知道他不安好心，当场一口拒绝，并骂他下流。中国的老百姓称领导干部报复下属为“穿小鞋”，丁德中惹了上司，当然也不例外。此后，她不仅被调出医疗队，个人档案中还被支部书记写上：“思想落后，不靠拢党组织”。从此以后，丁德中无论调到哪一个单位，都被划入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另册”。

潘良儒和丁德中的人事档案中都埋下了“定时炸弹”，但两人对此均一无所知，加上潘良儒心中的“党的信任”，人也活得无忧无虑。一九五九年，他们的大女儿降生，四年后又添了第二位千金，加上潘良儒带回国的小儿子和丁德中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一家六口，幸福美满，婚后六年多的平静日子，一晃就过去了。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共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毛在运动初期所制定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第三“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人民日报还嫌不够，又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声言凡是被怀疑对毛有二心的人，都要被横扫之。

老毛一声令下，共产党的大小干部无不胆颤心惊，唯恐被定成“走资派”。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整天和科学家打交道，耳濡目染，脑筋可能比其他单位的领导要好使。运动初期，为保他们自己，先“声东击西”，“转移视线”把丁德中等口无遮拦的人的言论搜集整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鬼蛇神劳改队”。凡在大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应对“牛鬼蛇神劳改队”不陌生，进去的人的人身自由完全被剥夺，还要剃一半光头的“阴阳头”。挨大小会的批斗，挂大牌子游街示众，都是家常便饭，更不许回家。

据大陆官方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有两千万人被整，被杀或自杀，一亿人受到株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人间惨剧。中国科学院里知识分子成堆，留英的，留德的，留法的，留美的，留苏的比比皆是，个个“历史问题复杂”，挨整的比例更高。丁德中被隔离审查后，潘良儒也和其他受株连的家属一样，忍气吞声，谨言慎行，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娘，照顾着四个孩子。

又过了一阵，所领导为进一步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以保住他们自己，又将并无任何凭据的所谓潘良儒的“特务嫌疑”抛了出来。从美国回到祖国十一年之后，潘良儒才猛然醒悟过来，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调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去做与自己专业根本不对口的科学研究。为澄清事实，他提出和那位郭姓的同学当面对质，遗憾的是郭姓的同学因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文化大革命被当成“走资派”揪出批斗后，自杀身亡，死无对证。潘良儒此时有理说不清，只有暗自叫苦。在隔离审查期间，潘良儒凭着倔强的性格，拼死顶住严刑拷打，亦不为“坦白从宽”的利诱所动。审了一阵，看看从他身上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把他放出来，在家中“反省交代”。

父母挨整，孩子们遭殃。在他们的四个孩子中，两个女儿还小，丁德中带过来的儿子十一，二岁，也很幼稚，最在精神上感到困惑的是潘良儒从美国带回国的儿子。一九五五年潘良儒被驱逐回国时，他已经七，八岁，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是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正好十八，九岁。他尽管长着一张普通中国孩子的脸，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可他的经历和想法却和普通中国孩子大不相同。他曾十分恐惧地被美国移民局押解出境，离开了亲生的母亲，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他的印象中，父亲刚回中国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他也曾听父亲讲过自己宁折不弯，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故事。为什么事隔仅仅几年，父亲竟被说成是“美国特务”，自己也被同学们骂作“美国特务的狗崽子”。他想不通，也咽不下这口气，一时陷入对人生的疑惑，最后导致跳楼自杀。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生命，在经历了在美国和中国的双重摧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扼杀了！

太太一直被隔离审查，儿子自杀身亡，自己早年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现在又被中国共产党打成“美国特务”。“潘良儒何去何从？”不仅批判他的大字报这样问，潘良儒也在这样问自己。“我对前途极为悲观，脑子里一片空白”。潘良儒说到这里声音低沉，眼睛湿润，周围一片沉静。

人在绝望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去死。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数都数不清，其中有他心爱的儿子和报复他多年的郭姓同学。“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潘良儒在万念俱灰之后，也选择了自杀之路。一天晚上，趁孩子们熟睡后，他轻手轻脚地从睡衣上抽出衣带，将它拴在窗框挂窗帘的支架上。四岁的小女儿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醒了。她看见爸爸正在窗前拴一根绳子，就睁大了眼睛问：“爸爸，你在那里干什么？”潘良儒怕吓坏了孩子，就指着窗框问女儿：“过一会儿，爸爸要是挂在那儿，你怕不怕？”“我怕，可是你的脸别朝着我，我就不怕了。”潘良儒听到了孩子天真幼稚的回答，心都碎了。他泣不成声地抱着小女儿亲了又亲，直到女儿又睡熟了，才将心一横，登上椅子，踩着窗台下的暖气片，把绳子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再向外一蹬，人就悬在空中失去了知觉。在那一瞬间，他唯一想到的就是“脸朝窗外，千万不要把女儿们吓坏了！”潘良儒讲到这里，眼泪夺眶而出，屋里的人也都哭了。

按照老人们的说法，人死后要去阎王爷那里报到的。大概是潘良儒的寿数未到，阎王爷不收，又把他赶回了人间。潘良儒悬挂在空中失去知觉后，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那根旧的丝织睡衣带断了，把他摔到地板上。孩子们被响声惊醒后，大声哭喊，才有好心的邻居叫来了急救车。人虽然得救了，可从此，潘良儒又多了一个罪名“畏罪自杀，企图自绝于党和人民。”在那黑暗的年代，人们求生难，求死也难呐……

老毛死后，“四人帮”受审，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丁德中从牛鬼蛇神专政队释放回家，潘良儒摘去了“美国特务嫌疑”的帽子，两个女儿相继考上了大学，丁德中的儿子上上了“夜大”。从死亡线上挣扎了十几年的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

一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留美的学者和教授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很多人被逼自杀，很多人在“五七干校”被折磨死。侥幸活下来的人中，有很多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而后自己也跟着移居国外。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上，有着太深的并且是永远也无法抚平的创伤。过去亲手整死他们的亲人和故友又欲置他们于死地的大量“文革左派”，在文化大革命后，依然高高在上，很多人还因整人有“功”而入党或加官进爵。受迫害的人怎能咽下这口气呢？除了告别当年满怀爱国之情回来的祖国，重去海外漂泊之外，他们别无更佳选择。

潘良儒是个不服输的硬汉子，他在平反后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怨气，反而在以后的十年中，开辟出等离子体研究的一片新天地。他还想在祖国继续努力奋斗，以证明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当年回国的无悔……

在文革开始时，我正是大二的学生。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军宣队以莫须有的罪名整肃了大批师生，并将我和其他几位同学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判刑劳改。一九七九年我们得到平反，蒙冤逾九载。相似的苦难经历使我们两家结成了“忘年之交”。隔长不短的，互相通电话，走动走动。太太们本都是直脾气，一来二往，先生们也受到太太们的熏陶，讲话也不那么拘谨客气了。

一九八八年底，丁德中离开大女儿家，前往纽约。她先做针灸按摩师，后来进入一家珠宝公司，负责宝石的检验和分级，并在皇后区租了一套公寓。不久，潘良儒也搬去了纽约。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岳父母赴美探亲，我们开车北上去接他们回弗吉尼亚。在纽约期间，我和太太专程到潘良儒家拜访。那时，潘良儒已经申请了绿卡，但是新的困扰再次降临。原来，经过康奈尔大学朋友的帮助，潘良儒找到了一九五五年随他前妻留在美国的儿子。他是位很成功的医生，并曾担任过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私人医生。丁德中和潘良儒的朋友都劝他去和儿子取得联系。可是潘良儒觉得，自己回国后一事无成，随他回国的小儿子又因为他的株连而自杀身亡，无颜面去认在美国的这位有钱有地位的儿子。“我见到他能和他讲什么？”潘良儒瞪大了眼睛十分激动的对我说：“讲我在这里是共产党嫌疑，在中国是美国特务，我还……”他停顿了好一会儿，刚要继续说下去，却又把话咽了下去。我知道他想说因为受他的株连，造成小儿子的自杀，就重重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潘老师，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默默坐在那里不再说话。

看过白桦编剧的电影《苦恋》吗？当听到画家凌晨光悲愤的自问：“爱国也会犯错？”凌晨光的女儿星星满腔血泪的呼喊：“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谁不感到浑身的震颤？！其实，剧中凌晨光的困惑也是很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满腔热情从海外归来参加建设，却被蹂躏抛弃的赤子们的困惑，一道毕生苦苦思索而迈不过去的坎儿。他们不能接受因爱国归来反而害了自己，害了家人的残酷现实。我想，这大概这就是潘良儒过去不愿拿绿卡和今天不愿认儿子的原因罢。

一九八九年中，我们先后两三次拜访了潘良儒夫妇。一九九零年，我受聘于美国西北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后，就再也没有和潘良儒夫妇见过面。一九九一年，丁德中曾和我通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话中说：“潘老师还是老脾气，政府分给他的一套两卧室的公寓，他迟迟不肯办理手续。免费送给他家具，他只拿了其中的一把椅子，其余的说什么也不要。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简单干脆：‘我不是到美国来要饭的！’”当年令人尊敬的康奈尔大学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几十年之后再从中国回到美国时，竟成了两手空空，不得不靠政府救济的穷人，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该向谁倾诉，这几十年的磨难，该把账算在谁的头上？！

我不能劝说潘老师，只有解劝丁德中：“潘老师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咱们就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一九九一年后，潘良儒一家搬去了纽约长岛，并更换了电话号码，我们从此失去了联系。

二十几年没有潘老师的消息了，但我们一直惦念着他和他的全家，盼望能听到他的好消息也衷心地希望他精神愉快，健康长寿！

~~~~~

## 【荒唐年代】

###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经历

• 许木公 •

#### 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又称文革（1966。5—1976。10）是建国以来，最动荡不安阶段，被称为“十年浩劫”。毛泽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通过大字报，大揭发，大批判，把被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中国才有发展前途。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为红太阳商店，反修路等等。红卫兵还在街上剪行人的小裤腿、烫头发；揪斗学者，文艺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毛泽东这时却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发表，更把运动推向高潮。一张大字报，全国乱了套。

北航的红旗战斗队的头子韩爱晶夺取了党政大权。一天上午在操场，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把系主任以上的第一把手，基本上都揪了出来，当作走资派批判斗争。我们教研室于主任，党支部书记孔主任。都是老革命，老干部，给他们的罪名是修正主义分子。起因是中苏决裂前，党委宣传部听取他们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方针是对的。因此认定他们是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变相体罚。大会斗完，小会斗。在批斗他们的小会上，红卫兵要他们承认错误，他们坚贞不屈，死也不低头。红卫兵小将把于主任的脑袋按到讲台上猛打，血流满面。

我与他们相处挺好，他们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尊教他们。面对他们的委屈，我内心彷徨，纠结，当时我想，如果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也是，大家都是。况且他们并没有公开散布，是党内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什么错？后来在有红卫兵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我便提出自己的看法。岂料一个小将说：许老师你是保皇派，跟他们划不清界限。文革中我只是政治经济学小组的组长，也成了保皇分子。

#### 2、自动对号入座

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教学工作中断，近5000学生全部停课，停止招生，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处处笼罩着恐怖主义气氛，人们彷徨，恐惧，无助。人人都可贴别人的大字报，人人都可能被别人贴陷害的大字报。有些干部、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面前胆颤心惊，

对国家，失去希望；对自己前途失去信心，最后走向自我灭亡。

单老师当时和我住在一幢宿舍楼，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常有交往。他高中毕业，在学校负责文艺宣传工作。运动开展不到三个月，他就在宿舍自杀身亡。究竟原因是什么，人们都说他有历史问题。他经常情绪低沉，最后服毒自杀。杨老师是我的同事，教政治经济学课的老师。他比我大二岁，湖南石门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有学问，写有一手好毛笔字，是大家认可的秀才。我来北航时，他是党支部组委。我们都有密切交往，他曾经几次带我到北京大学找他们系的专家、教授取经。

文革开始不到一年，有人贴他大字报，说他是三青团骨干。教研室的造反派决定开会斗争他。一天上午八时左右，红卫兵小将说，请许老和老王，到杨老师家通知他马上来开会。我们到他家后，家中开着大门，屋内外无人，厕所反锁着，打不开。老王个高，趴到窗上一望，大叫一声，老许不得了，杨老师上吊了。老王赶快从厨房，拿来菜刀，乒乓几下，砸碎了玻璃，要我爬进去，把厕所门快打开，他急忙跑到保卫部叫人。我从未干过这种事，心脏急速跳动，心想救人要紧。进去后，我首先想去掉他的绳套，但我一人怎么也解不开，心急如焚。我为了壮胆，嘴中不住说，老杨你不应该这样啊！很快保卫部校医院来人了，认定他获救无望。

我离开杨老师家，才发现我的右手掌被玻璃划得鲜血淋漓，身上也是血斑点点。医治后，一年多才痊愈。杨老师上吊前，吃早饭时，坚持与他爱人，每人吃半个煮熟的鸡蛋，寓意两人即将分离。死后留下二个才十多岁女儿。文革后清查的结果，发现他是三青团的小队长，没有什么大问题。领导说他是自取灭亡，把自己划到牛鬼蛇神一边去了。

### 3、批斗彭德怀

1967年7月26日上午，我从阜成门外洪茂沟家中，赶到学校来开会，才知道要批斗彭德怀。我们拿马扎坐到学校的操场上，除我校师生外还有部分地质学院的员工，约有几千人。当时我想，北航造反派头子韩爱晶这个人真不简单，居然能把这样一位大人物揪了出来。参加陪斗的还有张闻天，吴晗等人。批斗时间不长，会后被一一押上卡车，游街示众。当我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还看到押解他们的卡车，在口号声中缓缓驶过。

这是北航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我一生中难以抹去的反思。我敬佩彭德怀，我为他的下场鸣冤叫屈。他功大如山，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有什么错，有什么罪？我怒斥韩爱晶，为他后来的下场，被判刑叫好！韩爱晶是江苏涟水人，生父为革命牺牲，继父是一个干部。性孤僻，后考上我校，文革中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等人，被公认为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他在批斗彭德怀的内部小会上，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逼供和殴打，致使肋骨骨折，肺部受严重内伤。1983年，依法判处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我更憎恨以中央文革为首的极左势力，没有他们这帮人的授意，韩爱晶一伙也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 4、老子英雄儿好汉

1966年7月全市风传这样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对联的意思很明确：老子是老革命，儿子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老子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难怪有人说，这副对联是“鬼见愁”。对联在北航一贴出，产生轰动效应，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一天的黄昏，当我路过2号楼前，看到台阶周围聚集着许多人。一打听，说是红卫兵正在辩论这副对联。我心想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不是表态了吗？他说这副对联是“血统论”，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翻版，还有什么好辩论的。正在此时，只见一位红卫兵，高声问一位年轻老师，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不对？这位教师回答说：“当然不对”。话音刚落，这位小将“叭”一声，打了这位无辜教师一个耳光。

文革期间，我们家住在阜成门外。坐在公共汽车上，我想到我们教研室的叶老师，红卫兵无中生有，怀疑她是叛徒，在辩论会上她据理反驳，被红卫兵一巴掌，打倒在桌子底下，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至今未愈。如今又看到红卫兵亲自动武。心想辩论会成了流氓打人会了。

当年红卫兵其所以如此嚣张，说穿了有最高统帅撑腰；当最高统帅态度一变，又开始抓“5·16分子”，把红卫兵打翻在地。

## 5、慰问老院长

我一到北航，就有人向我介绍武院长的先进事迹。说他1926年，年仅15岁便接触了共产党人，参加政治活动。1928年，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一面宣传反帝反封建，暗地里却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国民党拘捕。他在法庭上怒斥法官，坐了7年监牢。他把牢狱作为扩大共产主义阵地，自己独立成立共产党支部。出狱后，为了找组织，他不顾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奔赴延安。经过多次曲折审查，他矢志不移，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担任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期间，他以拉人力车为掩护，为党作了许多贡献。1954年，他被任命为北航党委书记，院长。

我进北航第一次过组织生活，就同他在一个小组。每次开会他从不迟到，不早退，和我们一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易近人，没有官僚习气。他深入学生食堂，同校工一道挑土挖荷花池。在一次支部会上，他要我们给他写个讲稿，谈谈解放以来的新气象。党支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根据报纸上一篇文章，加以发挥。指出解放以来有十多十少，自行车多了，走路的人少了；吃饱饭的人多了，乞丐少了等等。后来他通过广播把我写的稿子全部念了一遍，并说这不是他写的。他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8年大跃进，他坚持学校学习第一，抵制大搞爱国卫生运动，他认为学校的中心工作应该是教学，为此受到市委严厉批评。不久，他被调到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

文革中武院长受到红卫兵的批斗，遭受痛苦折磨。北航红卫兵把他巧妙地藏了起来。一天教研室的龚老师和陈老师，约我和其他二位老师，躲闭暗哨，在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去慰问他。他说我在旧社会，有过多年的牢狱生活，什么苦都吃了，这点考验不算什么！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实在少有！文革后，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继续关心着北航的发展。为我们系联系研究员，协助我们提高教学质量。

北航人都很怀念他。好人长寿，如今他已103岁高龄。

## 6、抄家

文革中抄家是一种常态。我校党委副书记胡晓先家，被抄出一些有蒋介石头像的旧邮票。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说他企图变天，留恋旧社会。我老伴爱好集邮，看到形势不妙，我回家后赶快把老伴保存的珍贵邮票付之一炬，以除后患。岂料有一天晚上，老伴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突然来了七、八个造反派成员，一进家门把我九岁的女儿关在厕所审问，并动手打她；把我十一岁的儿子关在小房间问话。同时家里箱箱柜柜，旮旯晃晃，被他们翻了个遍。老伴紧

张得一个劲要喝水，要上厕所。我虽然惶惶不安，但我想前几天，中央有一个文件不许抄家，我就跟这些懂得法律的家伙、有的还是我们的好邻人争辩。我说你们搞法律的凭哪一条、哪一款来抄我们家？这些话都是对牛弹琴，浪费吐沫，他们根本不听。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折腾，最后把老伴押上汽车，带走了。汽车开行前，留下一句话：“有事情会通知你！”那夜我无眠，坐如针毡，想得很多。当抄别人家时，我的心情是漠然无情，无痛苦感。事到临头，才体验到抄家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打击。在那种无法无天，混乱的年代，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第二天一早我找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要人。留给我的记忆是他们对此事也知道，告诉我你先回去，不要急，会放人的！过了二，三天老伴才回来。

事后，我才知起因是，老伴是他们单位，仅有的铁捍保皇派成员，她们收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张鼎丞的一些材料，证明张是个好干部，造反派就是为追讨这些材料来抄家的。这就是荒唐的文革，带给我们家的灾难。

## 7、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1968年，我们教研室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召开了一系列的小会大会。事先由造反派的领导人提出要清理的重点人。针对每个人成立专案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个小组长，负责内查外调，初步摸清重点对象的问题。然后，通过教研室大会，请当事人到会交代、检查、批斗，最后由群众审核，报上级审批。

在北航众多单位中，其他单位清理阶段，都很顺利，领导决断定案。唯有我们政治教研室，还有校医院这两个单位，领导感到碰到老大难问题，收不了场。关键是我们政治教研室有几个刚直不阿，不跟风，不唯上的老师。

小小的政治教研室不过30多名教师，要清理的对象就有5人。其他老师的问题，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只有肖老师的问题，难以定夺。文革中肖老师主动交待了反右运动中自己曾写日记，同情全国知名的一些右派。造反派成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个右派，应定性为漏网右派。开始没有反对意见，我想大家有顾虑，怕首先表态，弄不好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首先站出来表示疑异的是吴老师，明确提出反对。接着造反派中有人指责吴老师是肖的同事同乡，有包庇的嫌疑。在这个时候我毅然站到吴老师一边。我觉得肖老师是自觉向组织表白的问题，不应拿来定罪。再说他一直表现很好，并没有反党行动，不能扩大打击面。双方激辩中，彼此怒目相视。特别是每次吴老师发言时，有理有据有节，常常一次发言就是一个小时。大家很爱听。

文化大革命冤枉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所幸我们的肖老师没有被人推到敌人一边去，最终成长为哲学教授。

## 8、非正常死亡

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仅有许多人被审查，被批斗，也有一些人含冤而死。这里只讲我的所见所闻。

一天午饭后，我去主楼办公室休息。当我上楼梯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我走一步，她也跟着上一步。我从下一看，是教基础课的一位女老师。过去我们经常见面，我进教室，她走出教室，有点头之交。所以见到她，我也没有与她讲话，彼此仍微笑示意。我坐在办公桌前休息，

还听到我顶层皮鞋击地的响声。不到一刻钟，听楼下有人大叫：快来人呀，有人跳楼啦！等我从四层奔下去，只见围拢一圈人。挤上去一看，正是那位女老师。接着保卫部，校医院来人查验，宣布人已死亡。保卫部有人跟我透露，运动以来，北航主楼和四座副楼门洞前，都有人从高层跳下，自杀身亡。最惨的是校医院一对夫妇不堪运动的陷害，全家自杀。

北航“校志”对这些无详细资料，但写了一些实情。文革期间，北航院内成立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 9、墙头草，随风倒

回想文革期间，我跟随共产党做了许多蠢事，作了许多虚功，真是后悔。中央文革指示一发出，我们这些不明事理的人，便跟着韩爱晶的指挥棒起舞。武汉爆发大规模武斗，韩爱晶积极组织全体师生，到京西宾馆去游行，高呼：打倒陈再道！我也跟着去了。其实武汉的事，和我们这些教师有多大关系！

中央文革发出“揪军内一小撮”，我也随队伍，到郊区西山一带的军事机关前，挥舞小旗，示威游行。在路上步行来回七，八个小时，夏日炎炎，又渴又累。大家一路用边聊天，边嬉戏，来转移疲劳。这纯粹是浪费青春，吃饱了，没事干，被忽悠。游行回来没有多时，最高指示说：“还我长城”，意为谁让你们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要毁我们的江山吗？风向剧变，造反派从此也遭殃了。真是出尔反尔，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群众包括我一头雾水，无所适从。

文革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也造反。1967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震惊国内外。我也跟随造反派队伍到现场助威。大家拍手欢呼，齐唱“东方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个个好像吃了耗子药，兴奋得了不得，以为伟大领袖真成了世界主宰、皇帝。

事件的结局。我们的总理周恩来感慨说：“由于斗争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直到1971年，周恩来不得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向英国政府公开表示道歉，并赔偿一切损失。

这一系列荒唐的事，使我逐渐认识到，遇事要动脑，不能盲从不能随风倒。

## 10、“不三不四派”

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员恢复过组织生活，开始整党。把在文革中，表现不够格的党员，清除出党，纯洁党的队伍。造反的红卫兵党员，由于出身好，又紧跟中央，作个不痛不痒的检查，很快便过了关。我是属于重点帮助的对象，几次检查都得不到认可。

我检查说，在文革初期，我是保皇派，保校领导、教研室领导。后来我随大流，大家不想去、不愿干的工作，我都积极参加。比如要支持工厂造反派，让我去协助，我毫不犹豫，打着背包就出发。让我去北京火车站，维持混乱的秩序，三餐不定时，我也是自愿前往。要支援同仁堂药店职工造反，我也跟着造反派一道去呐喊，助威！尤其是大家不愿看校门，因为值夜班不能睡觉，我在那里一干就是几个月。在那里非常辛苦，不仅睡不好安稳觉，而且站在校门口，像疯子一样，见到行人便高声大叫：“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等等。叫得口干舌燥，这个岗位也不是好干的。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革命派，也不是逍遥派。我对得起党，我是个不三不是派。

当我话音刚落，会场一下沸腾起来，乱了套。教研室一位最年轻的红卫兵党员萧遥老师，非常气愤、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我说：“许老师你不是什么不三不四派，你是死心塌地保皇派，是教研室走资派的大红人。你在运动中有的发言，具有鼓动性，起了坏作用。”还有几位老师表示支持她的意见。

我想不通，心想你刚来教研室不久，文革中，又生了二个娃娃，经常不上班，倒成了革命派。这次你很快就过了关，而我积极在文革浪潮中‘游泳’，却再三被批。再说教研室有二位老教师，和我同来北航，工作、教学上不认真，这次倒成了革命派。这不是是非颠倒吗？我决心顶着，不认错；他们也坚持不让我过关，彼此僵持着。这一来使我很痛苦，那段时间脑子想得很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甚至哭泣。过去的运动整别人，没有体会，这次整到自己头上，才知道运动整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我要感谢潘老师对我的启示。他对我说：“老许，你要学会脑子转弯，适当时要妥协。你退一步，跟他们唱一个调，问题不是就解决了。”他说：“文革初起，我起来夺权。谁知很快，红卫兵又夺了我的权，说来说去都是自己斗，没有是非。”我听了他的劝告，问题很快解决。不料潘老师几年前，已老年痴呆，这就是人生！

事后，我才逐步领悟到，我们教研室整党时的真正领导权，仍然掌握在造反派手中，造反的红卫兵党员整保守的党员。有人说，文革是共产党窝里斗，说得倒也形象。如果再来一次文革我愿向萧遥老师学习，在家生孩子，抱孩子。像我的八弟学习，当逍遥派。这是聪明之举，利用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远离红尘，远离是非之地。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